

THE EMERGING POWERS'
GROUPING IN
GLOBAL CLIMATE POLITICS:

全球气候政治中的 新兴大国群体化

结构、进程与机制分析

A TENTATIVE STUDY BASED ON STRUCTURAL,
PROCESSUAL AND MECHANISM ANALYSIS

赵斌 著

THE EMERGING POWERS'
GROUPING IN
GLOBAL CLIMATE POLITICS:

全球气候政治中的 新兴大国群体化

结构、进程与机制分析

A TENTATIVE STUDY BASED ON STRUCTURAL,
PROCESSUAL AND MECHANISM ANALYSIS

赵 斌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气候政治中的新兴大国群体化：结构、进程与
机制分析 / 赵斌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9

ISBN 978 - 7 - 5201 - 5132 - 0

I. ①全… II. ①赵… III. ①气候 - 政策 - 研究 - 世
界 IV. ①P46 - 0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36989 号

全球气候政治中的新兴大国群体化 ——结构、进程与机制分析

著 者 / 赵 斌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宋浩敏

文稿编辑 / 商筱辉 陈素梅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 (010) 59367150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4.5 字 数：260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5132 - 0

定 价 / 8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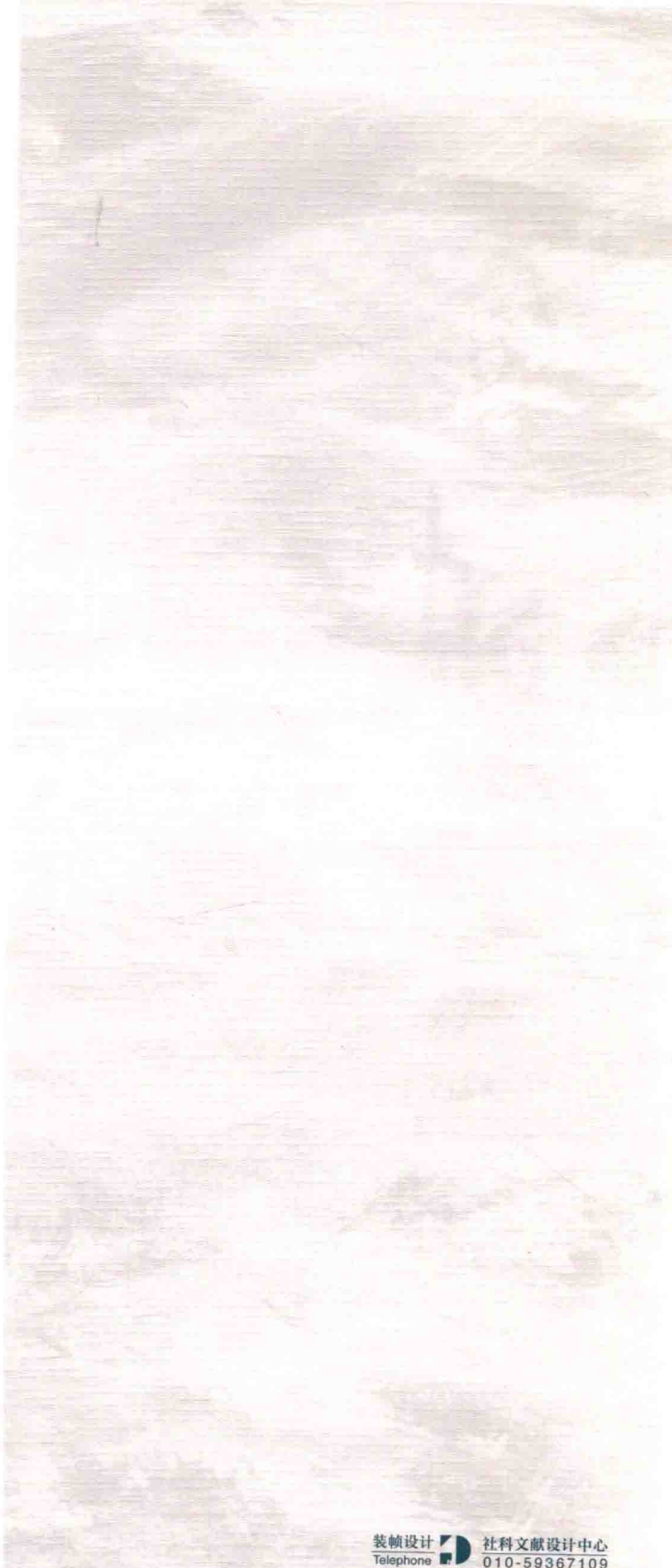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赵斌，1985年生，江西遂川人，武汉大学法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英国爱丁堡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全球气候政治。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项、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项、西安交通大学“新教师科研支持计划”项目1项，同时参与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等省部级课题多项；在《当代亚太》《欧洲研究》《南亚研究》《国际论坛》等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其中多篇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政治》全文转载。



本书出版得到 2018 年度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
著作出版基金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全球气候政治与新兴大国崛起	1
第一节 气候变化与新兴大国：新议题 + 新行为体	1
第二节 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研究新进展：理论与实践	20
第三节 核心概念与分析框架	30
第一章 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结构分析	35
第一节 全球气候政治的参与主体	35
第二节 全球气候政治的核心议题	40
第三节 全球气候政治的制度结构	45
小 结	57
第二章 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进程分析	58
第一节 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背景（1992 ~ 2018）	58
第二节 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演进	61
第三节 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特点	73
第四节 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进程中的分歧	77
小 结	84
第三章 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内生机制分析	86
第一节 双层互动与新兴大国身份	86

2 / 全球气候政治中的新兴大国群体化

第二节 新兴大国气候政治变化	95
第三节 新兴大国气候政治变化的动因分析	111
第四节 新兴大国在全球气候政治群体化中的身份选择	126
小 结	138
 第四章 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外部机制分析	140
第一节 伞形国家与新兴大国的气候政治互动：权力之争	141
第二节 欧盟与新兴大国的气候政治互动：利益相容	156
第三节 其他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大国的气候政治互动： 南南合作	162
小 结	168
 第五章 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意义和前景	170
第一节 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国际政治意义	170
第二节 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上升困境	182
第三节 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前景展望	185
第四节 新兴大国气候合作与中国气候外交：进一步的 研究方向	189
 参考文献	193
 后 记	226

绪 论

全球气候政治与新兴大国崛起

客观而言，自然世界的气候环境变化始终是一个变动不居的事实。人类自有史以来，生产生活也始终与气候变化等自然条件密不可分。然而，当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为政治所裹挟，环境/气候政治由此形成。于是，作为政治议题的气候环境问题，其行为后果似乎难逃这么几种可能情境：要么通过政治行为体的良性互动寻求某种合作治理，以降低或化解气候环境风险；要么长期徘徊于行为体间政治博弈进程，沦为工具理性算计下的牺牲品；要么不得不从属或内嵌于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成了某种附庸议题……

后冷战时代以来，世界政治的变迁，使得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议题的重要性提升，人类似终于开始重新反思和评估全球化、工业化、科技化进程中的环境代价，并在全球政治互动中开始商讨气候环境风险的应对之策。同时，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也开始快速成长，崛起中的新兴大国，难以避免会在全球问题领域投射其自身逐步抬高的国际影响力，影响国际秩序变革，重塑全球治理进程。

第一节 气候变化与新兴大国：新议题 + 新行为体

一 问题的提出

尽管全球公害事件时有发生且触目惊心，然而截至 20 世纪 60 年代，人类的

环境保护意识仍长期处于沉寂状态。1962年,美国生物学界首次对以“征服自然”为核心理念的主导思想提出了质疑之声,批评破坏环境的工业利益集团,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开始觉醒。与20世纪60年代仍处于冷战的历史大背景同步,其实不单在美国,整个欧亚大陆都开始反思人类过往经济增长模式的代价效应。及至70年代初期,1972年厄尔尼诺现象爆发,南亚、澳洲、中美洲、东亚以及苏联都遭到冲击,进而出现全球性的粮食短缺,同年正好是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问世,影响深远。这一年,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还召开了首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把每年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开启了世界各国商讨人类环境问题之先河。^①随后,欧美进入长达十年的“滞胀”时期,能源危机席卷世界,这在学界、政界等引发了环境主义思潮的兴起。显然,气候变化问题起初也是作为环境保护问题之一而被科学家提出。1974年,世界气象组织开启气候变化科学研究,但直到1988年,气候变化议题的重要性才上升到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高度,主要的标志在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成立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相应的科学依据。当然,质疑之声从未停歇,气候变化怀疑论颇有声势。^②

与此同时,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是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态势强化突进时期,国际政治逐步演化为世界政治^③,呈现“复合相互依赖”,气候变化议题因之获得了一定的上升空间(由“低级政治”逐步上升为“高级政治”)。“任何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都对别国产生了代价效应”,人们不得不在全球政治互动

① 斯德哥尔摩会议引发了全球关注,使环境议题首次嵌入国际政治,并逐渐成为国际研究和政策讨论的重要分支。参见 Neil Carter, “Climate Change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 in Mark Beeson and Nick Bisley, eds., *Issues in 21st Century World Politic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 177。

② Stephen Schneider, “Detecting Climatic Change Signals: Are There Any ‘Fingerprints’?”, *Science*, Vol. 263, No. 5145, 1994, pp. 341–343; Siegfried Fred Singer and Dennis T. Avery, *Unstoppable Global Warming: Every 1500 Years*,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7; 赵宏图:《气候变化“怀疑论”分析及启示》,《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4期,第56~63页。

③ 世界政治,或曰全球政治,指的是政治关系在时空上的拓展和延伸,其中的政治权力和政治行为跨越了主权民族国家的边界,也正是在全球化的时代意义上,“世界政治”与“国际政治”在政治权力主体、议题领域、结构特征等方面存在差异。参见 David Held et al.,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49。

体系中给予气候政治一定的话语空间；关于气候变化的探讨亦促成了相互依赖的社会和政治网络，形成了以多边反馈为特征的全球复杂系统。^①也就是说，主权民族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等所谓世界政治行为主体多元化，位列全球气候政治当中，表达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或寻求利益的兼容，或难以避免走向冲突。诚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用“气候变化的政治”来描绘世界气候风险社会图景，气候变化风险已然成为全球政治博弈的核心议题；类似的，保罗·哈里斯（Paul Harris）之所谓“威斯特伐利亚之殇”（Cancer of Westphalia）、“污染者敌意”（Malignancy of the Great Polluters）和“现代性迷失”（Addictions of Modernity），亦从国际体系、国家和社会层次上全面反思了气候政治失败。^②气候变化问题^③说到底仍是政治议题，如果我们考虑到人的自反性，气候变化认知大致可分为三种典型的社会观念情境：乐观主义、现实主义、悲观主义，称之为自反性气候政治；气候政治的自反性，即反映了一种全球风险，并昭示着现代性本身的深刻危机，这种风险的全球性，对地球上的生命均构成了威胁，无所不在的风险远离了个人的能力甚至国家的控制。^④ 鉴此，本书一概用气候政治指涉宏观的气候变化问题，认为全球气候政治的提法更为全面，包含气候治理、气候谈判、气候政策等变化进程（具体说明除外）。可以肯定的是，既然全球气候政治呼唤全球治理，尤其是全球气候治理，那么自然涉及诸多全球气候政治行为体的参与问题。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尤其是传统工业化国家，乃至后起的新兴国家（本书将着重观照新兴大国），由于温室气体排放规模与其快速增长几乎同步，因之引发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同样引人注目，这些大国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政治中的地位仍旧举

①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4th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2011, pp. 30, 262.

② 参见 Anthony Giddens, *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9; Paul G. Harris, *What's Wrong with Climate Politics and How to Fix I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③ 根据 IPCC 报告，准确地说气候变化问题应更侧重于指涉“人为气候变化”（Anthropogenic Climate Change），即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将导致显著的全球升温；人类活动已明显地改变全球气候。参见 IPCC, “Climate Change 2001: Synthesis Report”, <https://www.ipcc.ch/pdf/climate-changes-2001/synthesis-syr/english/question-1to9.pdf>.

④ 严双伍、赵斌：《自反性与气候政治：一种批判理论的诠释》，《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54~59页。

足轻重。^①

那么,问题在于,通过回溯全球气候政治变迁史,我们发现的国际关系现象,即后起的新兴大国,如巴西、南非、印度、中国等逐步形成了“抱团打拼”的趋势,即从早期的“G77+中国”到当前的“基础四国”(BASIC),再到(可能的)“金砖国家”(BRICS)平台下的气候合作,这之间有无规律可循?或者说,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形成机制是什么?是否仅仅如现实主义者所断定的——“权宜的协调”仍反映出“权力均势”/“大国政治的回归”?显然不是,至少在气候变化这一叙事情境^②中,单纯用权力现实主义的逻辑(如经典的制衡与联盟理论)难以有效解释/诠释新兴大国群体化这一国际关系现象。

为分析和探讨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本书拟首先从全球气候政治这一话语背景/叙事情境出发,讨论其参与主体、核心议题与系统结构。从复杂系统论

① 目前对于界定新兴国家的标准和方法,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一些国外研究聚焦于国家权力的维度(dimensions),尝试为新兴国家列出了七限定性因素,即地缘、人口、经济、资源、军事、外交和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而传统理论认为只有大国(great powers)或超级大国(superpowers)才可以还原这七大权力维度。参见 Thomas Renard, *A BRIC in the World: Emerging Powers, Europe, and the Coming Order*, Brussels: Academia Press, 2009, pp. 24-25; Thomas Renard and Sven Biscop, ed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Emerging Powers in the 21st Century: How Europe Can Shape a New Global Order*,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Chapter 3。国内新近的研究从经济、政治和历史这三重内涵来对“新兴国家”进行概念辨析和理论解读,从而区分出“最核心的”、“重要的”和“边缘的”新兴国家。其中,“最核心的”新兴国家有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重要的”新兴国家指埃及、土耳其、阿根廷、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沙特阿拉伯;“边缘的”新兴国家包括巴基斯坦、菲律宾、孟加拉国、尼日利亚、越南和伊朗。参见周鑫宇《“新兴国家”研究相关概念辨析及其理论启示》,《国际论坛》2013年第2期,第69页。此外,现有研究对新兴国家与新兴大国亦较少做严格区分,二者常指代同一国家群体且不影响读者对该现象的理解,但本书倾向于使用“新兴大国”这一提法,以分析具体的相关大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案例。

② 所谓叙事情境(narrative scenario),本是语言学和社会学中的一个常用概念,即行为体叙事或行动时所处的话语背景和活动舞台,是包含了时空场域的客观存在。将“叙事情境”迁移运用到社会科学当中,可以形象地描绘研究对象所处的复杂情境。具体到气候政治的“叙事情境”,则既整合了全球、区域、国家等地理空间维度,又涉及社会、经济、环境、技术、能源等动因的混合结构,这些要素的存在甚或相互作用,从客观上限定了行为体应对气候变化时的活动舞台。参见 IPCC, “Narrative Scenarios and Storylines”, <https://www.ipcc.ch/ipccreports/sres/emission/index.php?idp=12>; Ayami Hayashi et al., “Narrative Scenario Development based on Cross-impact Analysis for the Evaluation of Global-warming Mitigation Options”, *Applied Energy*, Vol. 83, No. 10, 2006, pp. 1062-1075; Sabrina Scherer, Maria A. Wimmer and Suvid Markisic, “Bridging Narrative Scenario Texts and Formal Policy Modeling through Conceptual Policy Model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Vol. 21, No. 4, 2013, pp. 455-484。

的视角观之,首先全球气候政治无异于一个复杂系统,了解其系统与进程,自然要从宏观、中观、微观进行全方位把握。宏观而言,即全球气候政治系统本身,其显著特征在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全球公共物品供求,因之目前形成的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缺乏实质约束力的机制复合体 (regime complex);^① 中观而言,新兴大国群体化崛起,本身也是值得思考的国际关系研究对象;^② 微观而言,则在于新兴大国行为体,如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等大国的气候政治参与,是不容忽视的助然/许可要素 (enabling or permissive element)。^③ 当然,说全球气候政治是一个复杂系统,这不等于是我们在面对它且试图分析其中的新兴大国群体化现象时就束手无策。因为复杂系统具有历史,它随着时间而演化,过去的行为会对现在产生影响,任何对于复杂系统的分析,如果忽视了时间维度就是不完整的,或者至多是对历史过程的共时快照。^④ 如此,本书从新兴大国所处的全球气

① Kirsten H. Engel and Scott R. Saleska, "Subglobal Regulation of the Global Commons: The Case of Climate Change", *Ecology Law Quarterly*, No. 32, 2005, pp. 183 - 233; Barry Rabe, "Beyond Kyoto: Climate Change Policy in Multilevel Governance Systems", *Governance*, Vol. 20, No. 3, 2007, pp. 423 - 444; F. Biermann, P. Pattberg and Fariborz Zelli, eds.,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beyond 2012: Architecture, Agency and Adap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Robert O. Keohane and David G. Victor, "The Regime Complex for Climate Chang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9, No. 1, 2011, pp. 7 - 23; Joanna Depledge and Farhana Yamin, "The Global Climate-change Regime: A Defence", in Dieter Helm and Cameron Hepburn, eds.,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433 - 453.

② 石斌:《秩序转型、国际分配正义与新兴大国的历史责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2期,第92页;韦宗友:《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与全球治理改革》,《国际论坛》2011年第2期,第11~12页;花勇:《论新兴大国集体身份及建构路径》,《国际论坛》2012年第5期,第50~51页;章前明:《从国际合法性视角看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对国际秩序转型的影响》,《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第10~11页;Andrew F. Cooper and Agata Antkiewicz, eds., eds., *Emerging Powers in Global Governance*, Canada: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2008; Parag Khanna, *The Second World: How Emerging Powers Are Redefining Global Competi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9; Theotônio dos Santos, "Globalization, Emerging Powers,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38, No. 2, 2011, pp. 45 - 57.

③ 这里借鉴的是亚历山大·温特对(大国的)"自我约束"这一主变量的定位,认为这是形成集体身份的助然或许可原因(enabling or permissive cause),其余三个主变量即"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和"同质性"则均为主动或有效原因(active or efficient causes)。参见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43。

④ [南非] 保罗·西利亚斯:《复杂性而后现代主义——理解复杂系统》,曾国屏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第6页。

候政治系统、新兴大国群体（自群体互动、自群体与共同他者间互动）^①、新兴大国个案比较这三大维度进行初步尝试。具体而言，我们关注的新兴大国群体，主要包含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这五个大国，之所以选取这五大国作为主要的案例分析对象国，是因为这些新兴大国既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和共性（比如，五国同为金砖国家，2010年南非加入金砖国家群体，原有 BRICs 由此改写为 BRICS^②，新兴大国群体的地缘政治意义和代表性也相应拓展），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和分歧。从研究的角度而言，这样的案例选取可能有些“自讨苦吃”，即选取的个案间的差异极大，分歧与共性同样不少见。然而，看似对研究“不利”的所谓“负面案例”（如俄罗斯的气候政治立场），其实更有助于验证相关研究的理论效度：其一，正负案例的比较，可以避免循环论证；其二，负面案例限定范围，使方法论更科学，可能提炼出的理论亦更精致；其三，还可以从负面案例中尝试发现新的机制，补足现有理论。^③ 因此，新兴大国自群体的气候政治互动（“G77 + 中国” vs. “基础四国”、“基础四国” vs. 俄罗斯、“金砖国家平台下的气候合作”），新兴大国自群体与共同他者间的气候政治互动（“基础四国” vs. 美国、“基础四国” vs. 欧盟、“基础四国” vs. 伞形国家群体、“基础四国” vs. 其他发展中国家），新兴大国自身的气候政治参与（历程、变化机制等），这些都是本书需要仔细分析和讨论的主要内容。

二 理论基础与视角

本书无意于建构宏大理论，或寻求所谓国际关系宏理论突破。事实上，诚如反映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最前沿动态的《欧洲国际关系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JIR）一组专题研讨论文所揭示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终

① 关于自群体（in-groups）与共同他者（common others）之间的二元分类，有助于强调群体认同与（群体内、群体间）互动的社会意义。参见 Henri Tajfel *et al.*, “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Intergroup Behaviour”,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1, No. 2, 1971, pp. 149 – 178;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292 – 293, 322, 339 – 340, 355。

② 除非特别说明，本书的“金砖国家”均指包括南非在内的金砖五国，而为表述准确和论证需要，笔者用英文简称 BRICs 来指代“金砖四国”（机制），BRICS 则为金砖五国（机制）。

③ 参见左希迎、唐世平《理解战略行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第184页。

结”，即不少蜚声学坛的国际关系名家不得不承认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已经走向“死胡同”，国际关系学科甚至亦因之遭遇上升“瓶颈”；范式之争索然无味，相关大理论创新乏力，主义之说（-isms）皆沦为各学派“自我陶醉”的信念；难能可贵的、还有发展前景的，主要在于中层理论（mid-level theory）和世界政治折中主义（eclecticism）可能取得的进展。^① 这些理论家们的“自我解嘲/批判”，让我们不难联想起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马丁·怀特（Martin Wight）曾提出的训诫，即“国际关系理论本身象征着某种智识和精神的双重贫困”。^②

当然，尽管囿于此类种种理论创新之客观困境等局限性，却不等于说本书将一味回避理论问题，已有的相关经典理论论述仍将构成本书可能借鉴的重要视角和参照。具体而言，本书不再遵循“从理论到理论”的分析路径，而主要从经

① Tim Dunne, Lene Hansen and Colin Wight,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3, 2013, pp. 405 – 425; John J.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 Walt, “Leaving Theory Behind: Why Simplistic Hypothesis Testing Is Bad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3, 2013, pp. 427 – 457; Andrew Bennett, “The Mother of All Isms: Causal Mechanisms and Structured Plur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3, 2013, pp. 459 – 481; Chris Brown, “The Poverty of Grand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3, 2013, pp. 483 – 497; Charlotte Epstein, “Constructivism or the Eternal Return of Universal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y Returning to Language Is Vital to Prolonging the Owl’s Fligh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3, 2013, pp. 499 – 519; Stefano Guzzini, “The En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Stages of Reflexivity and Modes of Theorizing”,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3, 2013, pp. 521 – 541;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and Daniel H. Nexon,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aradigmatic Era: From Substantive Wagers to Scientific Ontologi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3, 2013, pp. 543 – 565; David A. Lake, “Theory Is Dead, Long Live Theory: The End of the Great Debates and the Rise of Eclectic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3, 2013, pp. 567 – 587; Christian Reus-Smit, “Beyond Meta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3, 2013, pp. 589 – 608; Christine Sylvester, “Experiencing the End and Afterliv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3, 2013, pp. 609 – 626; Arlene B. Tickner, “Core, Periphery and (Neo) imperial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3, 2013, pp. 627 – 646; Michael C. Williams, “In the Beginning: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lightenment and the En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3, 2013, pp. 647 – 665.

② Martin Wight,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20.

验困惑出发,即对新兴大国群体何以“抱团打拼”进行相关的解读,主要从历史研究和案例比较入手,而后尽可能地提炼出些许理论认识。例如,(微观上)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中观上)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形成机制等,而在宏观上,如全球气候政治系统这一叙事情境,则主要还是引介和参考已有的相关认识。简言之,本书的理论意义在于,通过对全球气候政治系统结构这一宏大叙事情境的考察,将新兴大国群体化国际关系现象放置该情境中,借助具体议题导向(减缓、适应、资金、技术等)框定该群体化的边界,并比较和总结新兴大国(个案)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最后尝试发现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整体)的形成机制。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所谓变化机制和形成机制的发现,之所以可能具有理论意义是因为:机制(mechanism)“是一个过程,它存在于系统中,可以引发或者阻止整个系统或其子系统的某些变化”;机制能够将某些因素/要素串起来,从而驱动/阻止变化;单纯的因素/要素分析可能只是静态的,需要通过机制才能起作用。^①鉴于此,可能涉及的理论视角至少包含如下四个维度。

其一,集体身份理论。^②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这一概念主要来自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在社会学中,集体身份是一种用于解释社会运动的有力分析工具,它不仅指涉系统进程中的行为体自身,如领导模式、意识形态和沟通方法,而且强调该行为体还会被外界盟友和竞争者塑造。^③从社会心理学上看,集体身份是行为体在心理上就某种特定社会集群的“对号入座”(psychic references in specific social constellations),如此一来,集体身份作为叙事网络而显现于进化进程中,该网络的发展路径取决于叙事结构。^④换言之,集体身份是一种社会建构,亦即从心理需求和动机上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本书

① Mario Bunge, “Mechanism and Explanation”,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27, No. 4, 1997, p. 414; 苏若林、唐世平:《相互制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当代亚太》2012年第3期,第13页。

② 对“集体身份理论”的讨论,参见赵斌《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形成机制——集体身份理论视角》,《当代亚太》2013年第5期,第115~117页。

③ Alberto Melucci, “The Proces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in Hank Johnston and Bert Klandermans, eds., *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e*,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pp. 44-45.

④ Klaus Eder, “A Theory of Collective Identity: Making Sense of the Debate on a ‘European Identit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 12, No. 4, 2009, pp. 431-432.

并不采取将集体身份先验给定或将新兴大国直接与之挂钩等同的做法，而仅将其视为形成中的、存在转换可能的一种认同（identification）。

在国际关系学领域，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堪称讨论集体身份的典型开拓者，他认为，集体身份内生于系统层次，并且在这一内生过程中产生合作。^① 温特在1994年的论文《集体身份的形成与国际国家》中，开始讨论国家间集体身份形成的因果机制，他区分出了三种不同机制，即结构情境（Structural Contexts）、系统进程（Systemic Processes）和战略实践（Strategic Practice），并讨论这些机制所分别包含的两个相关因素。^② 在结构情境方面，地区或全球国际体系为集体身份形成提供了互动平台，新现实主义者重视的是结构的物质性，建构主义者则在为物质力留有空间的同时强调该结构的主体间性；在系统进程方面，第一个进程在于提升相互依存度，这至少有两种形式，如增强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互动“动态密度”，或“共同他者”（Common Others）的突现（emergence）；第二个进程在于国内价值观的跨国趋同（突出表现在文化和政治领域，前者如全球消费主义的兴起，后者如民主制度、福利国家论和关注人权等）；在战略实践方面，包括行为（behavioral）互动和言语（rhetorical）交流。^③ 1999年，随着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的问世，其集体身份理论趋于成熟。他认为，集体身份是角色身份和类属身份的独特结合，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引向认同，使自我—他者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并在交界处产生超越，由于其具有因果力量，诱使政治系统把他者的利益定义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即“利他性”，如此一来，国家有望采取行动，克服集体行动难题。^④ 在利己身份给定的前提下，温特通过四个主变量即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以及自我约束来讨论集体身份的形成，其中，前三个变量是集体身份形成的主动或有效原因，第四个变量是辅助条件或许可原因（enabling or permissive cause）。^⑤

①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1992, p. 392.

② Alexander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No. 2, 1994, pp. 388-391.

③ Alexander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No. 2, 1994, pp. 389-390.

④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229.

⑤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343.